

我国国家公园社区生计转型研究进展与启示

刘洋¹, 李锋² (1. 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海南海口 571158; 2. 海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海南海口 571158)

摘要 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社区生计发展问题, 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 阐述我国国家公园社区生计转型研究的概况。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生计转型的概念、社区生计转型意愿、生计困境、生计风险、社区替代生计、生计转型的影响效应等。基于现有研究, 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社区生计转型综合性研究、生计转型阶段性规律及驱动力、文化的影响机制等主题。

关键词 国家公园; 生计转型; 可持续生计

中图分类号 X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07-0001-05

doi: 10.3969/j.issn.0517-6611.2023.07.00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Progress and Enlightenment of Community Livelihood Transition in Chinese National Parks

LIU Yang¹, LI Fe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1158; 2. School of Tourism,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1158)

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solve the problem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mmunity livelihood development in our national parks, based on the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of Chinese national parks.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discuss the concept of livelihood transition, community livelihood transition willingness, livelihood dilemma, livelihood risk, community alternative livelihood, and the impact and effect of livelihood transi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it is propos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ommunity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the phased rule and driving force of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ulture.

Key words National park;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

我国自 2013 年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 一直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国家公园不仅要注重对自然资源的保护, 还要关注社区居民在国家公园建立后的生计变化^[1]。全球有 50% ~ 70% 的保护地内有原住民, 他们祖祖辈辈居住于此, 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相互融合, 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2], 但原住民生产空间与保护空间交错重叠^[3], 国家公园的建立使得原住民传统生计方式受到限制, 古老有序的社区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同时原住民缺乏替代生计, 居民生计脆弱性明显上升, 社区经济发展受阻, 如何使原住民生计可持续成为国家公园建设核心问题。

可持续生计是个人或家庭立足于长远发展的目标, 通过获得谋生的资产、能力和活动, 维持和改善生活状况^[4], 而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从事采摘、伐木、开荒种植等是维持和改善生计方式的主要方式之一。研究表明, 国家公园的建立使周边社区居民生计面临更多约束, 例如对自然资源利用的限制、土地占用、土地利用方式限制等, 造成社区居民收入降低、就业机会减少、居民利益受到损害^[5-6], 生计转型是社区居民应对周围环境变化的最佳选择。大量研究表明, 生计转型能够在实现生态保护的同时促进当地居民生存发展, 实现国家公园和社区互利共生。基于此, 该研究对国家公园社区生计转型研究成果展开系统分析, 并提出其研究的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1 文献概况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 以“保护区”加“生计”“国家公园”加“生计”为题名、主题、关键词分别进行搜索, 并对获取的文献逐篇识别。最后, 识别出符合国家公园社区生计转型主题的文献 215 篇(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期刊、论文集、会议)、研究报告、学位论文以及著作专题章节。

基于时间维度, 我国自 2006 年开始关注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生计问题, 2015 年以后, 该领域文献数量逐渐增加, “可持续生计”是该领域研究的最主要内容, 近年研究主题也逐渐扩充到生计风险、生计转型、生计困境等多个领域。

基于空间维度, 该研究所使用的文献中有 198 篇是针对具体保护区的研究, 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 9 篇、祁连山国家公园 7 篇、武夷山国家公园 12 篇、钱江源国家公园 4 篇、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4 篇、大熊猫国家公园 12 篇。

基于研究方法维度, 该研究所使用的文献中理论研究有 17 篇, 其余均为应用性研究。其中案例研究较多, 主要是针对单个或几个目的地的研究。定性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文献资料法、半结构式访谈法、观察法等; 定量研究法多用于当地居民可持续生计分析, 主要方法为问卷调查法及 SPSS 计量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

2 社区生计转型的相关理论

2.1 生计脆弱性理论 生计脆弱性是生计和脆弱性合并的系统概念, 世界银行提出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 并且在应对风险时而导致财富受损或生活质量下降到较低水平的可能, 并认为脆弱性包含受到的风险威胁和抵御冲击的能力两方面, 该定义被学者广泛接受^[7]。结合居民生计研究, 可将生计脆弱性定义为当生计系统面临外部冲击、发展趋势变化、周期性变动等内外部风险时, 由于自身对

基金项目 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高层次人才项目(720RC611, 722RC676)。
作者简介 刘洋(1997—), 女, 河南郑州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家公园与旅游管理。
收稿日期 2022-09-01

扰动敏感以及缺乏应对能力,使生计系统易于遭受损失的性质和状态^[8]。基于此理论,社区生计转型研究中要充分考虑风险因素、生计风险抵御力、风险应对策略等。

2.2 可持续生计理论 可持续生计理论认为一种生计,在不过度损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够应对较大的风险和冲击并得到恢复,且能维持或改善其能力和资本,这样的生计才是可持续的。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作为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定性和定量描述模型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该框架由脆弱性环境、生计资本、转化结构与过程、生计策略、生计结果 5 个部分组成,该框架较为合理的阐述了个人或家庭生计活动的变化以及影响个人或家庭生计活动可持续的因素^[9]。可持续生计理论提倡以人为中心,运用到国家公园社区生计转型研究,就是将保护区社区居民作为核心进行讨论。基于此理论,社区生计转型应努力实现减少居民对自然资源依赖度、提高居民生计能力以及生计多样化的目标。

2.3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与其栖息劳作环境、物质生产环境及社会文化环境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10],在此类复合系统中,人是核心因素,所属的人工生态系统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两方面内容,两属性间的基本冲突是复合生态系统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国家公园与周边社区构成了一类特殊的复合生态系统,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了解这类生态系统的生态系统、演化轨迹与耦合机制,对整合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决策和周边社区发展需求具有前瞻性战略意义^[11]。

2.4 内生发展理论 内生发展即内源式发展,又称“自我发展(self-development)”,1975 年联合国报告总会“世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内生发展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要旨是地方发展模式从“输血式”帮扶式发展向“造血式”内生式发展转变,主要包含 3 项核心内容,即地方认同、地方参与以及本地资源的充分利用^[12]。随着研究的深入,内生发展与外生发展逐渐融合,形成新内生发展理论,该理论主张在坚持原内生发展的立场上,接纳市场、政府等超地方因素,强调内外互动的混合动力模式。基于此理论,在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社区生计转型不仅需要政府建立并完善补偿制度,更要注重社区自身能力的培育、本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于与主动性的激发,同时合理、有效地利用外部经济要素、智力资源、科学技术提升内生发展能力,提高国家公园周边居民的资源禀赋、生活水平、地方参与程度等。

2.5 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 Ulrich 提出,他认为现代社会中风险是常态化现象,将风险社会定义为“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13];之后乌尔里希·贝克等^[14-15]对风险的概念、影响、分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风险始终存在,是现代社会特征之一。在国家公园建设的背景下,社区居民作为弱势群体,在生计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各种风险,可持续生计遭遇挑战,将风险社会理论与居民生计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剖析居民在此背景下面临风险冲击时的生计状态。

2.6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源于管理学,1984 年 Freeman^[16]正式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他指出在某一活动中,能够对活动过程或者目标产生一定影响或者被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就是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既包括企业员工、股东、消费者、厂商等,也包括政府部门、银行、媒体以及其他会阻碍组织发展的机构或组织。从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经验来看,其利益相关者包括社区居民、地方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商业集团等,其中,社区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高,是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如何保障社区生存权与发展权、满足居民利益需求是国家公园可持续的重要方面。

2.7 农户行为理论 关于农户行为理论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个是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说,他认为,农户的投资行为和经营行为都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是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人^[17]。另一个是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自给小农学说,他认为,小农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是小农的目标,农户在生产生活中考虑的基本问题还是生存问题^[18]。在现实生活中,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农户的经济活动会受到一定限制。对于国家公园周边的居民来说,自然资源是他们生存的基础,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已经对当地居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也会进一步延续这种生活状态。因此,社区生计转型需要考虑在外生政策的冲击下,当地居民采取何种行为维持生计,以及这些活动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

3 主要研究内容

3.1 生计转型的概念 生计转型通常被认为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生活的职业或产业发生根本转变的过程,其本质是生计策略的变化,体现为生计资本的重新组合、或生计活动的重新选择、或资源获取机制的重新调整、或对生态环境的重新适应等^[19]。生计转型不仅反映了居民自身能力、资产以及必要生产活动之间的结合,也反映了社会制度、家庭关系以及在生活周期中资源获得机制的调整,更反映了居民对生态环境变化的适应^[20]。

3.2 社区生计转型意愿 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由于社区大多是被动进行生计转型,生计转型意愿较弱,在生计发展意向上,多数居民生计发展意愿的路径依赖性较高,比较愿意选择与目前生计一致的生计方式^[21],但也有研究表明,生计类型只是影响生计模式意愿的因素之一,年龄、性别、技能培训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生计意愿。针对社区居民生计转型意愿存在差异的现实,现有研究通过实证方法,对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具体可归纳为生计资源禀赋因素、生计活动类型因素、社会文化因素。

3.2.1 生计资源禀赋因素 多数学者研究表明,国家公园内居民生计资本存在整体脆弱性和各类生计资本拥有量存在一定差异性的结论。生计资本存量及组合方式决定着居民可选择生计方式,是居民生计选择呈现显著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人力资本指家庭劳动者用于谋生的知识、技

能、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等^[22],是影响居民转型方向的决定性因素,劳动能力与健康状况是居民生计选择的基础,对发展意向具有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知识的接收能力越强,从事非农化意识也越强^[21],技能培训能够提高居民的生产技术水平,进而增强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转型意愿,总之人力资本越多,居民可选择的机会则越多;自然资本指居民生计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物质资本指居民用于谋生的基础设施与生产工具,由于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具有黏性特征,拥有这2项资本较多的居民更愿意选择农业或以农业为主的生计策略;金融资本指居民实现生计目标的资金资源,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资源,包括社会网络、社会交往、社会组织等。金融资本给居民生计提供资金保障,社会资本能够体现居民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这2项资本存量较多的家庭向非农业转型的概率越大,而较少的家庭更愿意等待政府安排^[23]。

3.2.2 生计活动类型因素。居民原有的生计类型显著影响生计转型意愿。学者通过居民从事的生计活动和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为依据,将居民生计策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分类,研究表明,多数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原有的生计策略。对于纯农户来说,农业、种植业等虽然没有其他方式带来的收入高,但有保障并且有丰富的经验,是纯农户较满意的生计转型方向,其他收入方式为农业生产的补充^[24];由于非农户的生计方式不依赖于自然资源,所以更愿意维持原有生计方式^[21]。

3.2.3 社会文化因素。首先,社区居民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人口社会学特征的差异,导致不同社区居民的生计发展意向存在不同。年轻人因体力和接受能力较强而比年长者的意愿选择更具冒险性,更愿意选择外出打工、做生意等,年长者则倾向于选择务农、等待政府安排^[23]、发展旅游业^[25]等;男性比女性对选择做生意、外出打工、种植经济作物等生计模式意愿更强,而在发展畜牧业、湿地旅游方面,性别的影响并不显著^[23];婚姻状况对居民选择生计发展意向的影响较小;其次是地理因素,我国学者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发现居民的生计转型意愿具有区域差异性,例如相对于纯牧区而言,农区和半牧区地区耕地、草地较少,居民从事非农生产的意愿则较高^[21],其实质仍是受生计活动类型、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最后,城镇融入与公平感知、文化依赖对居民生计转型意愿也产生一定影响^[26]。

3.3 生计困境 我国学者采用自下而上的模式,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在了解当地居民生计现状的基础上对生计困境表现、生计困境成因、生计困境应对3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生计困境表现方面,资金短缺、缺乏生计技能、生计方式单一、就业困难等是居民面临的主要困境。陈传明等^[27]研究了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对园内居民生计的影响,指出缺少资金是居民面临的重大问题,为维持生计,采取非法伐木、偷摘药材等措施,进一步影响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居民可持续生计。生计困境成因在于重视生态保护而限制自然资源采集、技术培训投入不足、居民自身生计能力弱、生态补偿制度不完善、

文化制约等。国家公园建设对资源的限制利用使居民不能在保护区内打猎、采伐林木以及土地利用方式限制等,导致区内居民收入的减少;建立保护区之后,因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社区集体财力降低,对居民的技术培训投入减少,导致区内居民缺乏生计技能^[6];保护区大多位于偏远地区,区内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生计方式单一;受年龄、教育程度、思想意识等自身方面的原因直接导致就业困难^[27];现行生态补偿制度不完善导致居民无法得到预期的收益,进而影响居民生计水平;居民固有的生产生活观念也是制约居民生计转型的重要因素;在生计困境的应对方面,政府起主导作用,居民自身能力的提升是解决困境的核心,社会组织的参与则是助力^[28],应对措施包括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生计替代产业、培育居民自身技能等。如史俊宏^[29]提出在政策层面上,成立就业安置小组,引导居民生计转型,加强技能培训,拓宽生计方式,因地制宜选择替代产业如农畜产品加工等途径,实现居民可持续发展。李伯华等^[30]从农户角度指出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所面临的困境具有差异性,相比其他类型农户,纯农型更需要政府帮扶。

3.4 生计风险 生计风险问题归根结底是居民生计脆弱性问题,即居民生计难以应对外部风险冲击,造成生计断裂。生计风险是影响居民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学者对国家公园生计转型风险的研究包括风险感知与识别、生计风险评价、生计风险应对管理3个方面。

(1) 风险感知与识别。风险感知是风险识别的基础。风险感知是人的主观感受,人们的决策行为容易受到风险感知的影响,生计风险感知是人们对某种生计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具有系统复杂性、多因素关联性、区域差异性等方面特征^[31]。在生计风险感知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主要从居民角度分析个体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生计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例如个体文化程度、收入、生计资源禀赋、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生计方式等个体自身因素以及信息渠道、区位差异、交通通达度等外部因素,例如苏芳等^[31]通过定量方法分析了多个因素对生计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影响程度,指出生计资源禀赋对生计风险感知有着较大的影响作用,且不同生计资本对生计风险感知的影响存在差异。在风险识别方面,Smith等^[32]提出了一种由农户参与的风险地图分析方法,该方法能快速地对居民面临的风险进行识别,陈传波等^[33]对其的研究方法进行改进,利用开放式访谈的方法让居民描述所面临的风险并排序,在此基础上对居民的风险进行识别与归类,并形成一张风险地图,此方法被多数学者所接受。

(2) 生计风险评价。目前,生计风险的评价多是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学者基于风险属性^[34]、可持续生计框架^[31]、风险与脆弱性分析框架^[35]等方面构建生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脱贫农户^[36]、易地搬迁农户^[37]、生态移民^[38]、牧区农户^[39]、生态脆弱区农户^[31]的生计风险进行评价。例如Dercon^[40]构建风险与脆弱性分析框架,将居民生计风险分为资产风险、收入风险、福利风险;苏芳等^[31]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并结合案例地实际,从健康风险、环境风险、金融风

险、社会风险、信息风险 5 个方面构建了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此后,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环境与政策风险^[41]、教育风险^[36]等,进一步完善了生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在具体的评价方法选择上,采用最优组合赋权法^[35]、综合评价法及熵值法^[42]、BP 神经网络法^[43]、MPPACC 评估模型^[31]等对生计风险进行定量评估。

(3) 生计风险应对管理。风险管理是在风险识别与评估的基础上,为防范和处理风险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涉及环境、制度、文化等多个方面,同时又牵扯到多个相关主体,构建完整的生活风险体系,是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问题。在应对多重风险时,需要个人、集体组织等非正式组织、政府等正式组织共同采取防范措施。居民个人方面,风险抵御策略偏向于组合型,例如面对水资源短缺、极端天气等环境风险时,会采取利用储蓄、农业保险、政府补贴等调整型策略,面临生活开支大、贷款困难等经济风险时,会选择减少开支、借钱等。集体组织等非正式组织方面,合作社、行业协会等组织可以帮助参与居民提供金融担保,进而为其生产经营提供资金和信贷担保,教育和培训也能帮助居民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等正式组织方面,政府的扶持与引导对居民抵御生计风险具有重要作用。程红雨等^[44]提出要加大就业扶持力度、完善生态补偿措施、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体系等建议。

3.5 社区替代生计 为了解决生态保护与保护区建设中社区发展与资源保护的矛盾、降低生计风险、提高居民生计能力等问题,人们常采用替代生计来改变生活生产方式和行为,替代生计不仅可以促使个体生计活动发生变化,还可以改变居民生计资本存量及结构、社区发展能力。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替代生计方式、替代生计实施效果两方面。替代生计方式包括养殖替代、能源替代、种植替代、开发替代、经营替代、参与生态系统管护等形式^[45],帮助居民实现生计转型。如王瑾等^[46]认为以生态旅游为代表的旅游开发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鼓励社区参与,缓解社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生态旅游增加了大量的培训与就业机会,以及餐馆、旅馆、特产店等商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居民提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降低居民生计脆弱性,促进生计策略多样化,给居民带来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利益,同时促进社区发展。王昌海等^[47]提出通过开展能源替代项目、实施种蜂改良和反季节种植蔬菜等帮助居民增加收入。社区居民会在综合考虑政府政策、市场导向、社会参与、自身生计特征等因素下,选择合适的替代生计。从替代项目实施效果来看,虽然帮助居民增加了收入,掌握了一技之长,但存在项目实施效果差、后续项目发展艰难、甚至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等问题,项目实施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居民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制约^[48],究其原因,替代生计是以外力将某种生计途径强行切入原本的社区生态系统中,破坏了区域文化存在的文化整体性,造成生态区位失序^[49]。

3.6 社区生计转型的影响效应

3.6.1 个体微观层面。现有研究通过实证方法分析了生计

转型后居民生计条件、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首先,在生计条件方面,多数研究表明,生计转型后,居民的生计资本存量增加、生计类型呈多元化趋势,家庭收入明显上升,居民生计条件得到改善,生活质量有所提升^[50];其次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对自然资源依赖度下降十分明显,对食物资源的消费方式、能源使用方式也发生改变,但相关支出费用有所增加^[51];同时保护区建设加强了人们与外界的联系,就业机会随之增加^[52];再次,居民的生活观念、教育观念相比转型前发生了很大改变^[49]。

3.6.2 区域宏观层面。既有文献主要讨论了产业发展和生态效应,结果因地而异。现有研究指出,相关产业发展加强了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文化传承意识以及自然资源管理自觉性,提高了居民收入并促进社区发展^[4,48],但是存在居民收入不稳定、产业发展困难、区域发展不均衡^[53]、产业培训效果差^[49]、资源流失和文化消亡^[54]等问题,居民生计不能保障,就难以彻底解决人为活动对环境的破坏。

4 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1) 从研究主题上看,微观层面居民生计问题和宏观层面生计转型的产业发展与生态效应是该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在微观层面上,学者们主要面向国家公园周边农户或居民,探究了生计转型意愿、生计困境、生计风险、替代生计等内容。在宏观层面上,学者们主要研究了生计转型在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社区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效应。总之,此领域的研究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无论是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所扩展。

(2) 从研究方法上看,该主题相关研究的定性分析较少,较多地运用了数学方法,尤其是参与式农村评估(PRA)、综合评价法及熵值法在测度居民可持续生计和生计风险上得到了较多的运用,推动了国家公园社区生计转型的研究进程。

4.2 不足与展望

(1) 对居民生计转型研究成碎片化,难以引起政府和学者的重视。当前研究内容较多集中在居民生计转型的单一一方面,而生计转型涉及的各个方面都是紧密联系的,综合性研究相对缺乏。今后研究需加强对国家公园社区生计转型的综合性研究,从居民生计资本、环境与政策、文化适应等方面,完善国家公园社区生计转型研究。

(2) 生计转型阶段性规律及驱动力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理论。目前社区居民生计转型研究多集中于某一时间居民生计情况,而对居民转型前、转型中、转型后生活生产状况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缺乏从时间序列角度对居民生计转型阶段性规律的研究。未来研究中,在数据选择上,需要选取长时间面板数据,探明居民生计转变规律;在生计转型的驱动因素研究方面,明确促使居民生计转型的切入点及驱动因素之间的关系,揭示生计方式转变的关键障碍是居民生计转型研究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3) 缺乏文化对生计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生计转型是

一个社会文化重构的过程^[55]。国家公园内社区居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与当地文化生态系统相适应的生计方式,外部力量干预不当就会引起生计方式失范,给社区居民带来文化与心理不适。生计转型会引起生活生产方式、社会网络结构的改变,更进一步会引起文化不适、文化断裂等问题,文化是否适应也会反过来影响生计转型的情况,对国家公园社区生计转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朱洪革,赵梦涵.国家公园对不同类型林业职工家庭生计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例[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2, 21(1): 78-86.
- [2] 刘伟玮,李爽,付梦娣,等.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国家公园协调机制研究[J]. 生态经济, 2019, 35(12): 90-95, 138.
- [3] 彭奎. 我国国家公园人类活动特征、管理问题与调整策略[J]. 生物多样性, 2021, 29(3): 278-282.
- [4] 何思源,王博杰,王国萍,等. 自然保护区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发展[J]. 生态学报, 2021, 41(23): 9207-9215.
- [5] 杨彬如. 自然保护区居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J]. 水土保持通报, 2017, 37(3): 113-118, 124.
- [6] 宋文飞,李国平,韩先锋. 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农民发展意向的冲突分析:基于陕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 660 户农民的调研数据[J]. 中国人学·资源与环境, 2015, 25(10): 139-149.
- [7]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76-280.
- [8] 吴孔森,刘倩,张骥,等. 干旱环境胁迫下民勤绿洲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模式[J]. 经济地理, 2019, 39(12): 157-167.
- [9]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M].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68-125.
- [10] 马世骏,王如松.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J]. 生态学报, 1984, 4(1): 1-9.
- [11] 乔斌,张彦仁,何彤慧. 精准扶贫背景下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路径构建:基于宁夏党家岔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案例论证[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5): 633-637.
- [12] 张文明,章志敏. 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 社会科学, 2018(11): 75-85.
- [13] 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M]. 吴英姿,孙淑敏,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88-189.
- [14] 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等. 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 [15] 斯科特·拉什,王武龙. 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4): 52-63.
- [16] FREEMAN R E.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M]. Boston: Pitman Publishing, 1984.
- [17] 西奥多·W·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 [18] 恰亚诺夫 A. 农民经济组织[M]. 萧正洪,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 [19] 杨伦,刘某承,闵庆云,等. 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及对环境的影响研究综述[J]. 生态学报, 2019, 39(21): 8172-8182.
- [20] 张芳芳,赵雪雁. 我国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综述[J]. 生态学报, 2015, 35(10): 3157-3164.
- [21] 江进德,赵雪雁,张丽,等. 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12, 27(4): 552-564.
- [22] 刘菊,傅斌,王玉宽,等. 西部典型山区农户的生计状况分析:以四川省宝兴县为例[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6, 21(12): 144-154.
- [23] 朱红根,康兰媛. 退耕还湿农户替代生计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鄱阳湖为例[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9(3): 7-14.
- [24] 张春丽,佟连军,刘继斌. 湿地退耕还湿与替代生计选择的农民响应研究:以三江自然保护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08, 23(4): 568-574.
- [25] 鲍远磊,温小婷,蔡小英,等. 乡村旅游地区农户生计转型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5 村 202 户的调查数据[J]. 中国林业经济, 2021(6): 93-97.
- [26] 崔冀娜,王健,张晓慧. 青海藏区移民生计转型意愿及其代际差异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39(9): 16-21.
- [27] 陈传明,侯雨峰,吴丽媛. 自然保护区建立对区内居民生计影响研究:基于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72 户区内居民调研[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1): 219-224.
- [28] 桑晚晴,柴剑峰. 川甘青毗邻藏区农牧民生计困境调研:基于川甘青三省八县的调查实证[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2): 211-217.
- [29] 史俊宏. 生计转型背景下蒙古族生态移民非农生计策略选择及困境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5, 20(3): 264-270.
- [30] 李伯华,易韵,窦银娣.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农户生计转型和文化适应研究:以江永县兰溪村为例[J/OL].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06-30 [2022-08-16].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2.1178.N.20220629.1130.002.html>.
- [31] 苏芳,殷娅娟,尚海洋. 甘肃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19, 39(6): 191-197, 240.
- [32] SMITH K, BARRETT C B, BOX P W. Participatory risk mapping for targeting research and assistance: With an example from East African pastoralists[J]. World development, 2000, 28(11): 1945-1959.
- [33] 陈传波,丁士军. 中国小农户的风险及风险管理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 [34] 万文玉,赵雪雁,王伟军,等.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生计风险识别及应对策略:以甘南高原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5): 149-157, 190.
- [35] 陈传波. 农户风险与脆弱性:一个分析框架及贫困地区的经验[J]. 农业经济问题, 2005, 26(8): 47-50.
- [36] 肖轶,尹珂. 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识别与评估[J/OL].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06-29 [2022-08-22].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3513.S.20220624.1109.004.html>.
- [37] 高博发,李聪,李树茁.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J]. 经济地理, 2022, 42(4): 168-177.
- [38] 金莲,王永平. 生态移民生计风险与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城镇集中安置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的视角[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0(1): 94-102.
- [39] 董海宾,李平,侯向阳. 牧户生计风险应对策略对生计资本的响应研究:以内蒙古为例[J]. 中国草地学报, 2019, 41(6): 143-151.
- [40] DERCON S. Income risk, coping strategies, and safety nets[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2, 17(2): 141-166.
- [41] 付少平,石广洲. 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人口面临的生计风险及其防范[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1): 19-28.
- [42] 段伟,李冰洁,苏楠,等. 自然保护区加剧了周边社区农户生计风险吗?——以四川省、陕西省 17 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为例[J]. 林业经济, 2021, 43(7): 58-70.
- [43] 苏芳,李景坤,许韶华.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农户生计风险评价模型[J]. 冰川冻土, 2017, 39(6): 1381-1390.
- [44] 程红丽,陈传明,何映红. 牧户家庭资产禀赋对其生计风险的影响:基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调查[J]. 草地学报, 2021, 29(12): 2817-2826.
- [45] TEH L, CHEUNG W W L, CORNISH A, et al. A survey of alternative livelihood options for Hong Kong's fish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008, 35(5): 380-395.
- [46] 王瑾,张玉钧,石玲. 可持续生计目标下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以河北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王家寨社区为例[J]. 生态学报, 2014, 34(9): 2388-2400.
- [47] 王昌海,温亚利,时鉴,等. 秦岭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以长青自然保护区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1, 27(2): 150-153.
- [48] 杨明,骆江玲,明亮. 论替代生计项目在乡村的发展:以 NGO 在三江平原生态保护项目为例[J]. 农村经济, 2010(4): 101-104.
- [49] 庄孔韶. 可以找到第三种生活方式吗?——关于中国四种生计类型的自然保护与文化生存[J]. 社会科学, 2006(7): 35-41.
- [50] 赵雪峰.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以潘得巴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为例[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4(2): 195-200.
- [51] 李芬,张林波,陈利军. 三江源区生态移民生计转型与路径探索:以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为例[J]. 农村经济, 2014(11): 53-57.
- [52] 武照亮,周小喜,段存儒,等. 农户参与湿地保护有助于减贫吗?——基于自然保护区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OL].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03-22 [2022-08-17].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3513.S.20220321.1231.006.html>.
- [53] 王娅,刘洋,周立华. 祁连山北麓生态移民的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选择:以武威市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2): 521-537.
- [54] 李金明. 生态保护、民族生计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以独龙江地区独龙族为例[J]. 云南社会科学, 2008(3): 81-85.
- [55] 刘相军,孙九霞. 民族旅游社区居民生计方式转型与传统文化适应:基于个人建构理论视角[J]. 旅游学刊, 2019, 34(2): 16-28.